

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互动机制和实现路径

王 勇 蒋扬天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 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系统探讨了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互动机制, 进而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 提出了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一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为基础完善初次分配, 发展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以缩小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构建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 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推进产业不断升级; 二是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完善再分配, 改革消费税, 取缔非法收入, 实行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再分配政策,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完善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 产业升级; 共同富裕; 互动机制; 新结构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249 (2023) 02-0032-15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① 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更加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必然趋势。如何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 有效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 王勇,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 蒋扬天 (通讯作者),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20AJL017)。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22 页。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异质的,而且这种异质性是内生性的。^①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同,提升优化要素禀赋结构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②那么,产业升级将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又将对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同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升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并就产业结构升级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尔后,结合国内外相关数据,就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最后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出发,尝试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接近年均10%的速度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但是中国人均GDP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则呈现出先不断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经济学文献。^③国内外学界关于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如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影响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技能溢价以及基尼系数,^④收入分配如何通过影响居民的劳动供给以及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影响产业转型升级。^⑤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是在实现“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而不是单纯为了“共同”而牺牲“富裕”。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升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发展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全体居民的总收入,特别是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符合比较优

① 林毅夫:《共同富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国际金融》2022年第11期。

② 王勇、汤学敏:《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定量事实与理论进展》,《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③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政策的演变与展望》,《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1期;龚六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1期;尹俊、秦子忠:《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思路》,《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3期;句华:《共同富裕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趋势与路径》,《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5期;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Ravi Kanbur, Yue Wang, and Xiaobo Zhang, “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49, No. 2, 2021, pp 467-482; Martin Ravallion, Shaohua Chen, “Is that Really a Kuznets Curve? Turning Points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20, No. 4, 2022, pp. 749-776.

④ 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4期;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郭凯明、杭静、颜色:《资本深化、结构转型与技能溢价》,《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吴万宗、刘玉博、徐琳:《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Zsófia L. Bárány, Christian Siegel, “Job Polar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10, No.1, 2018, pp.57-89; Francisco Javier Buera, Joseph P. Kaboski, Richard Rogerson, et al., “Skill-Biased Structural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9, No. 2, 2022, pp.592-625.

⑤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Alexander Bick, Nicola Fuchs-Schündeln, David Lagakos, et al., “Structural Change in Labor Supply 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Hours Worked”,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30, 2022, pp.68-85; Kanishka Misra, Paolo Surico, “Consumption, Income Changes, and Heterogeneity: Evidence from Two Fiscal Stimulus Program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6, No.4, 2014, pp.84-106.

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提高当地就业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推进共同富裕。与此同时,自动化、智能化、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促进总量富裕时,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收入的不平等,这就需要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对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资给予公平的补贴,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更好地“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相应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经济体的总投资和总消费需求,有助于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活动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双促进”的格局。

毋庸讳言,当前,构建中国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双促进”的格局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地方政府“乱作为”,导致产业发展背离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市场上要素流通、商品流通面临卡点、堵点问题,遏制了产业的健康升级,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中国的纳税主体以企业为主,现行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和一段时间以来经济的内需不足,遏制了产业升级。笔者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分析认为:就初次分配而言,应该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为基础完善初次分配,鼓励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缩小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构建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推进产业不断升级;就再分配政策而言,改革消费税,取缔非法收入,实行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再分配政策,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则是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重要补充。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基于此,笔者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

(一) 产业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则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方面有赖于现有产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新技术,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低附加值产业转型至高附加值产业,同时附加值更高的新的产业不断涌现。^①笔者所指的产业升级便包含以上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指产业内部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明和引进,第二个维度指新产业的涌现以及低附加值产业转型至高附加值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的GDP从1978年仅占美国的5.30%,发展到了2021年达到

^① 林毅夫:《新中国成立70年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读》,《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

美国 GDP 的 76.97%，这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蛋糕”不断做大。在人均 GDP 方面，截至 2021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依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大致相当于 1986 年韩国与美国的人均 GDP 差距。中国当前的人均 GDP 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共同富裕的目标应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给予人民公平的发展机会。

从产业升级的第一个维度来看，如图 1 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划分，中国各部门内部的人均名义增加值均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反映出中国各部门内部的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上升。其中工业部门的人均名义增加值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工业部门内部新产品数量更是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从产业升级的第二个维度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份额不断下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值份额不断上升，反映出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开始由原本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图 2 展示了中国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工业部门名义增加值的份额不断下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名义增加值份额占比则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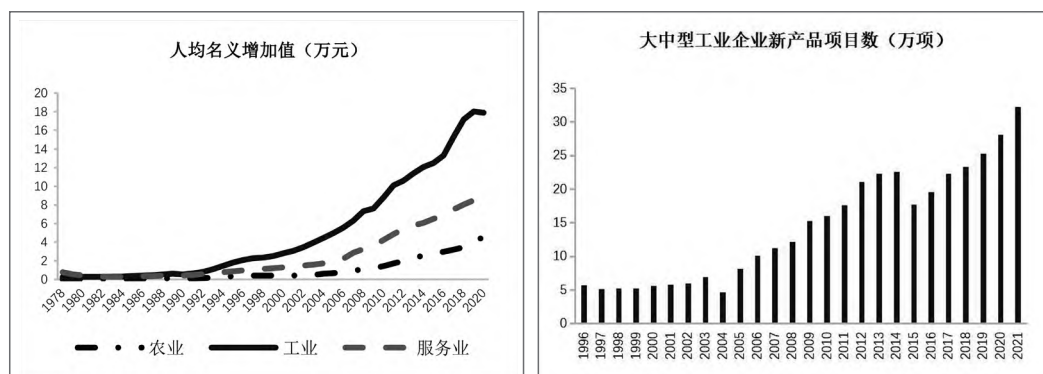


图 1 各部门人均名义增加值以及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项目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1978—2020 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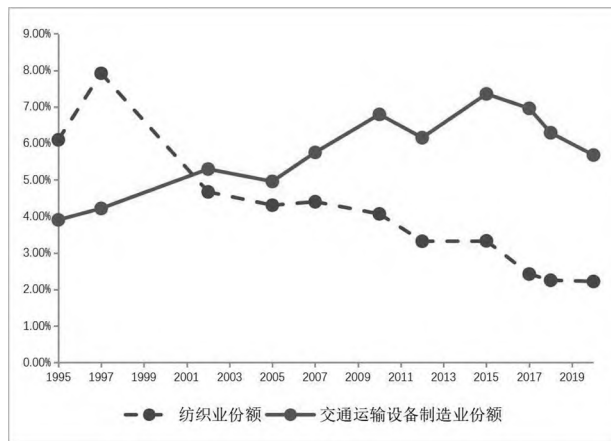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纺织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工业部门增加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1995—2020 年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

（二）收入分配格局呈现新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改善。图3展示了2000—2018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了先下降、后不断上升的U型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①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方向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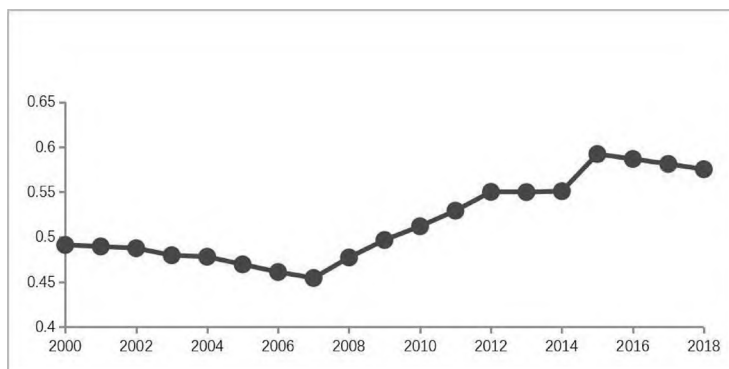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18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公布的社会经济数据（SEA）；
2015—2018年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

现有研究分别从结构性因素^②、周期性因素^③以及不完全竞争^④等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趋势作出了相关的解释。^⑤从税前收入分配格局来看，2008年之后，中国税前收入前10%的群体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42.69%下降到2015年的41.66%。与之相对应的是，2008年之后，税前收入中间40%的群体和税前收入底部50%的群体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⑥与此同时，中国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562下降到了2019年的0.555。^⑦从再分配后的税后收入分配格局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437下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7页。
- ②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刘亚琳、茅锐、姚洋：《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郭凯明：《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王林辉、袁礼：《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 ③ 常进雄、王丹枫：《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统计研究》2011年第5期。
- ④ 柏培文、杨志才：《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蓝嘉俊、方颖、马天平：《就业结构、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9年第6期。
- ⑤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5期。
- ⑥ Thomas Piketty,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9, No.7, 2019, pp.2469–2496.
- ⑦ 数据来源：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

降至2016年的0.38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以及2017—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了2019年的0.465。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从区域间不平等以及区域内不平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主要得益于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不平等程度的不断下降。^①图4展示了2000—2021年中国省际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可以看到，2003年之后中国省际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开始不断下降，反映出2003年之后中国省际间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同时，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自2007年开始不断下降，反映出2007年之后中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未得到有效缓解，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各自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②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面临着较高水平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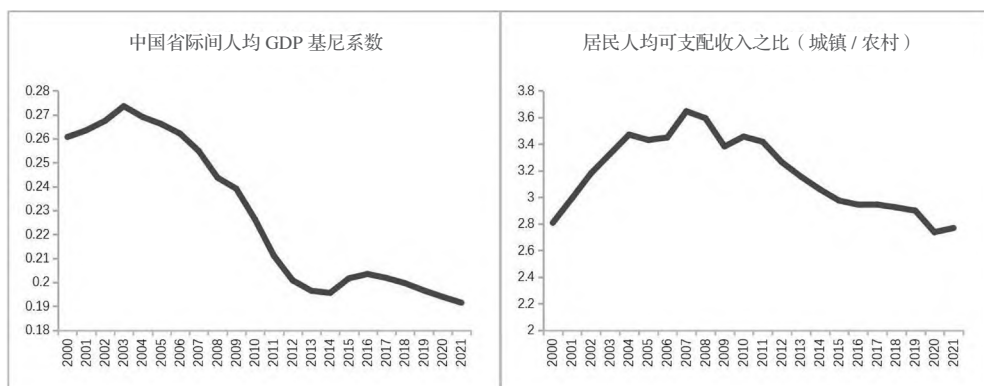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省际间人均 GDP 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相关性

从三次产业划分来看，图5展示了2000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5年不同省份工业增加值份额与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相关性。整体而言，一个地区工业增加值份额越高，则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带动作用。

① Ravi Kanbur, Yue Wang, and Xiaobo Zhang, "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

②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政策的演变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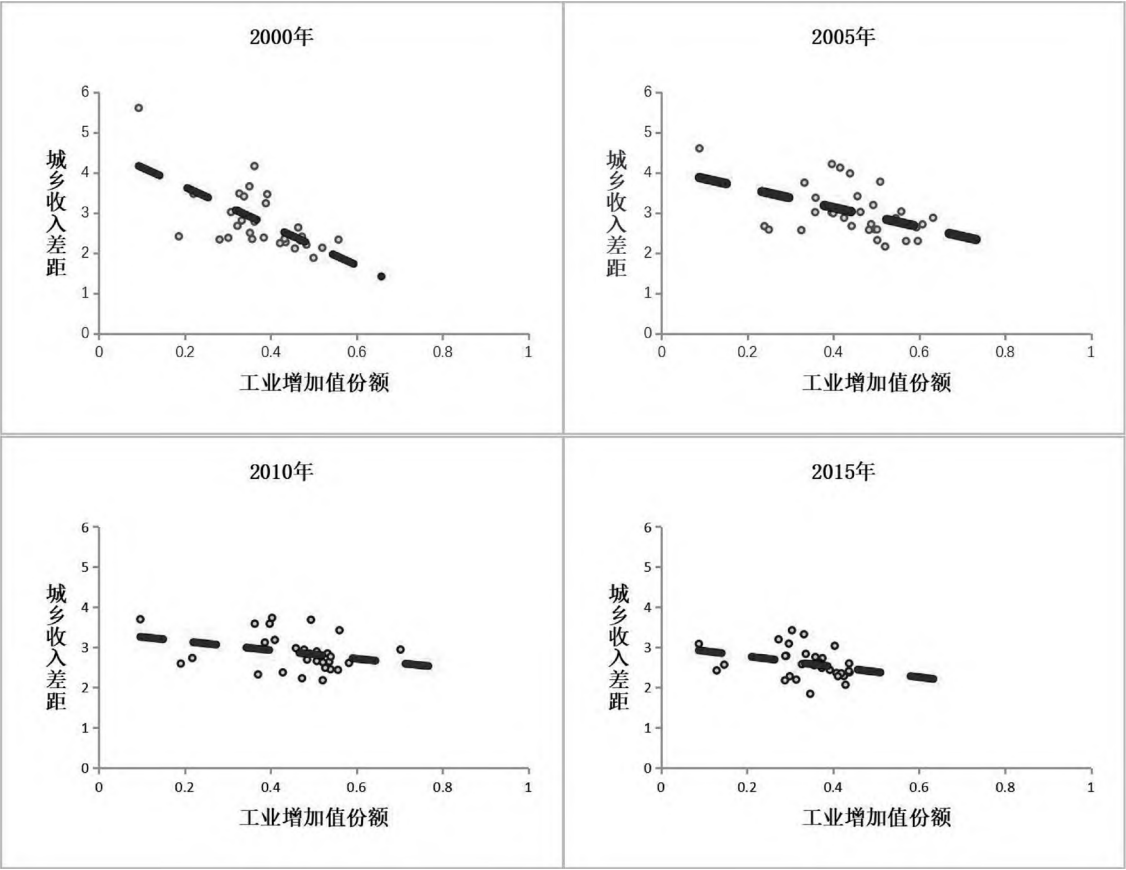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不同省份工业增加值份额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图中每个实点代表一个省份，长虚线为城乡收入差距与工业增加值份额之间的拟合线。

在细分产业层面，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资料，图 6 展示了工业部门内部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与一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相关性，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定义参考现有的研究，即“当一个行业的资本收入份额超过总行业资本收入份额时，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①可以发现，一个经济体资本密集型工业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则越低。此外，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财富不平等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②

① 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② 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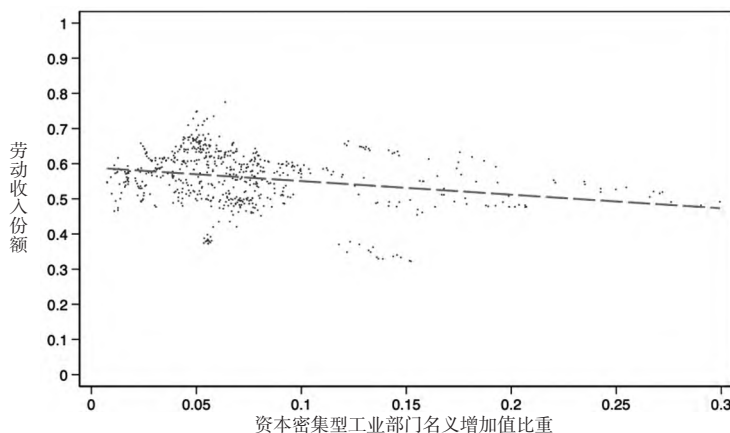


图6 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名义增加值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性

数据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注：其中不同的实点表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体，长虚线代表资本密集型工业增加值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拟合线。

三、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互动机制

基于上述定量事实，本部分主要探讨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互动机制。图7展示了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分配相互作用的主要机制。其中，产业升级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差距；而收入分配则通过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结构以及供给结构，进而影响产业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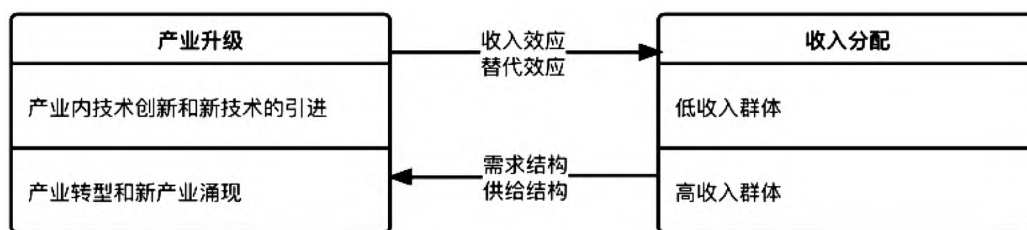


图7 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机制

（一）产业升级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

产业升级通过收入效应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减少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以中国部分贫困地区的发展为例，数字技术的引入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扩大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带领农户脱贫。^①这反映了产业升级

① 邢小强、汤新慧、王钰等：《数字平台履责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字节跳动扶贫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的第一个维度，即新技术的引进有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产业升级的第二个维度来看，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能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①以新疆和田地区的发展为例，和田地区劳动力充裕，通过建立产业扶贫实验基地，争取国家优惠政策，从而使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迅速在和田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这不仅有效促进了和田地区的产业升级，也成为和田地区破解贫困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新技术的涌现，包括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给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带来巨大冲击，进而扩大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②以富士康集团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和装配企业，在成功引进机器人生产线之后，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下降了30%。^③这反映了产业升级对低技能劳动力形成的替代效应，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然而，现代化建设不能因为产业升级的替代效应，就停止发展的步伐，放弃产业升级的目标。产业升级的替代效应，能够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实现有效对冲。就再分配政策而言，需要加强就业困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帮助失业人员实现转型和再就业；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而言，通过在职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帮助低技能劳动力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增加其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应该与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相匹配，如此才能真正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在人力资本上过度投资，不仅会挤占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资源，而且那些获得过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本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相反，如果在人力资本上投资不足，则会遏制产业升级，不利于经济发展。

（二）收入分配反作用于产业升级的主要机制

关于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国外学者主要从加剧社会矛盾、影响中间选民选票等视角出发，探讨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④笔者则重点强调收入分配如何影响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一方面，收入分配政策影响不同技能水平个体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第一个维度所需的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以及第二个维度高附加值产业产品的生产，都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而平均主义式的再分配政策会抑制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意愿，致使经济体整体的失业率上升，进而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福利陷阱”。

① 林毅夫：《共同富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② 龚六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③ 《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世界银行集团2019年中文版，第19页。

④ Torsten Persson, Guido 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3, 1994, pp.600-621.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影响经济体整体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以及2018年的调查数据，表1展示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储蓄率的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率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因此，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增加经济体整体的总投资，同时压缩经济体整体的总消费。而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将刺激市场需求，扩大市场规模，进而激发技术创新，通过“干中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反之，如果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应的产业升级也将停滞不前。

表1 不同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差异（%）

居民所在收入分位数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高收入的 10% 人群	65.17	58.81	55.15	53.83
中等收入的 40% 人群	51.00	47.26	44.45	45.79
低收入的 50% 人群	36.50	35.87	33.26	33.24

从消费结构内部来看，不同产业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同，有些产业生产必需品，有些产业生产奢侈品。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不一样，对于附加值高、收入需求弹性高、相对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言，社会需求总量不仅受总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分配。基于CFPS 2012—2018年的微观调查数据，表2展示了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的差异。分析发现，高收入群体（收入前10%）在高附加值产业上的消费支出份额（包括居住支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以及教育文化支出）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后10%）。

表2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差异（%）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低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食品	45.19	29.28	41.62	27.22	33.14	23.81	31.40	22.32
衣物	5.10	5.80	4.25	5.81	4.10	5.81	5.53	4.66
居住	16.87	25.31	22.81	28.93	30.79	32.23	25.63	37.17
家庭设备及日用品	4.95	9.11	4.12	8.68	5.68	9.22	6.09	8.83
医疗保健	15.71	7.24	11.28	5.70	9.39	5.88	11.36	6.16
交通通信	5.89	8.30	10.54	9.04	8.40	8.40	16.16	7.00
教育文化	6.30	14.93	5.37	14.60	8.51	14.64	3.82	13.84

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如果高附加值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只有高收入群体能够负担的话，社会对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总需求就会相对较低。此时，企业发明或采纳更先进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动力将会不足。只有合理的收入分配使得社会

总需求足够高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愿意采纳规模报酬递增的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或者过小都将对产业升级造成不利影响。^①

四、中国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互动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国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互动机制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部分地方政府“乱作为”,产业发展盲目跟风

已有研究指出,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放大经济体整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②当前中国部分地区的发展存在着背离当地比较优势,盲目跟风的问题。以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部分地方政府无视新兴产业发展规律,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同质化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一哄而上、一哄而散”。^③再以中国的产业扶贫为例,扶贫产业跟风发展、项目雷同、产品“撞车”等,导致许多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不仅无法为当地创造有效的就业机会,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既扭曲了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无法实现有效的产业升级,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④

(二) 要素市场以及商品市场流通不畅,供给受限

第一,就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投资而言,一方面,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大批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而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低人一等”,职业教育体系内技工学校和职业培训受人冷落。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中国产业发展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业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遏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也导致了一部分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⑤另一方面,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了不同地区人员流动的限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然而,在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报酬、工作条件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劳动保障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拖薪、欠薪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工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机会,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等。

第二,就资本市场而言,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以及营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原因,在金融市场中相对弱势,融资可得性、可及性差,表现为融资难;对能够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来说,金融机构为覆盖风险,在贷款利率中增加风险补偿,导致了融资贵。^⑥加之新冠疫情期期间,部分企业经营受到影响,企业发展面临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应收账款回收

① 王勇、沈仲凯:《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

② 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

③ 《布局新型产业切忌盲目跟风》,《中国能源报》2020年10月14日。

④ 《产业化扶贫不可入歧途,避免产业跟风引发低效竞争》,《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11月11日。

⑤ 《“毕业即失业”?如何打通大学生毕业就业“最后一公里”》,《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6期。

⑥ 《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专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7日第2版。

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企业之间盈利能力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共同富裕以及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就土地要素投入而言，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耕地资源被不断占用，各种建设开发活动导致土壤污染、耕地质量下降等，使得中国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非常有限，耕地保护形势非常严峻；另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土地资源利用率低，许多土地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人耕种的不良经营状态。耕地被占用，土地经营效率低，遏制了中国农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加大了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收入差距。

第四，就商品市场的流通以及供给而言，存在商品区域间流通不畅、商品生产受限等问题。这与要素市场中存在的问题类似。在商品流通方面，以农产品的流通为例，中国不少地区农产品的仓储、运输都需要冷链物流支持。然而，由于这些地区温控技术不足，冷库、冷藏车等设施设备缺乏，中国农产品在商品流通环节损失较大，阻碍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加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①在商品生产方面，目前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为主。近几年，受外需大幅下降、美国对华技术封锁等因素影响，中国产品生产受限，有效供给不足。外需下降、国外订单减少以及近几年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居民收入下降等，影响了中国产品的销售，导致部分企业裁员甚至破产倒闭，阻碍了中国产业的进一步升级，造成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高失业率，进而阻碍实现共同富裕。

（三）市场垄断与不正当竞争

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素市场的流通与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会对产业升级以及共同富裕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过于垄断的市场结构也将遏制产业升级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过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在给予先占据市场份额的企业先发优势的同时，也遏制了该行业中的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与先发企业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不利于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过于垄断的市场结构给予了先发企业过高的垄断利润，并让这些企业可能通过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遏制后发的中小企业发展，不利于共同富裕。以近几年中国新兴的平台经济为例，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使用数据密集型生产技术、规模报酬递增、成长速度快等特点，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五大类产业中属于换道超车型产业。然而，正是由于平台经济的这些特点，平台公司具备“赢者通吃”的属性，从而引发市场垄断，降低市场效率，不利于产业健康升级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四）税收结构有待优化

第一，中国税收结构的特殊性。中国的许多税种主要针对企业进行征税。图8显示了中国税收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其中箭头标注的是中国的税收结构），可以看出，中国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税制结构的差异导致了許多内生政策的差异。一个地区的税种如果主要针对企业，地方政府就会有很强的招商引资的动力；而一个地区的税种如果主要针对个人，地方政府的政策便会以吸引人才为主。税制结构的差异，对中国的人口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收入分配

^① 《加快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初一公里”》，《人民日报》2022年8月19日第18版。

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企业和资本征税过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阻碍产业升级，同时也会抑制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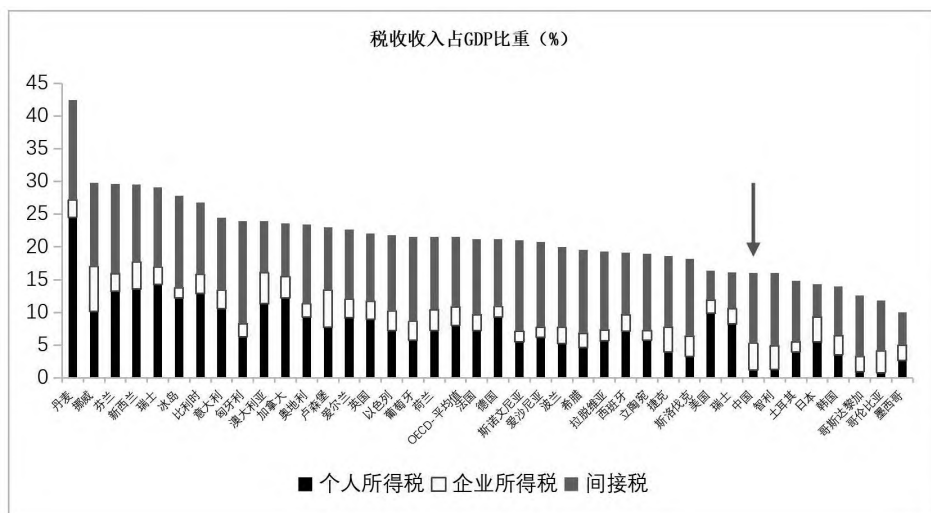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国家税收结构之间的比较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第二，中国现行的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在初次分配阶段，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相差不大。但是，经过再分配以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小。比如，2010年英国居民初次分配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3，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0左右，下降幅度接近30%。有学者利用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CHIP）计算得到，中国的再分配政策，仅使中国的基尼系数下降了8%。^①

第三，部分收入来源的不正当性。目前存在的非法收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通过非法途径，将公司的利润转化为个人所得，使得原本应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产业升级的资金进了个人的腰包；第二类是通过权钱交易获得的非法收入，部分官员利用自身职权，谋求私利，使得部分优质企业无法进入市场，阻碍了市场经营主体的公平竞争；第三类是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敲诈勒索等方式获取财富。^②部分群体获得大量非法收入，一方面扩大了收入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损害了社会公平公正，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资金空转，无法有效配置给合法的经营主体，从而阻碍了产业升级。

五、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针对中国产业升级以及共同富裕面临的突出问题，笔者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提出推进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的对策和建议。

① 李实：《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和政策的演变与展望》。

② 魏杰、谭伟：《从收入差别看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财贸经济》2003年第6期。

（一）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为基础，完善初次分配

第一，各级政府应当立足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既不能“无所为”，也不能“乱作为”。实现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从“授之以鱼”转换成“授之以渔”。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就能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贫困人口也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收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一个地区要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必须有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基于此，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地区，企业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地区，企业则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第二，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其一，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这有利于缓解中国就业市场上供需错配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就医、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依法保护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继续教育，提升其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有助于改善当前的就业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实现共同富裕。其二，针对资本市场的建设问题，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利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本地化的信息优势，鼓励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本地征信体系建设。同时，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与各地区产业升级、企业发展相适宜的金融体系。其三，就土地市场而言，坚守耕地红线，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以及土地资源整合，引导和帮助各地农户因地制宜，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助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其四，针对商品市场的流通和供给问题，减少商品（尤其是农产品）跨区域流通的壁垒，提高流通效率以及商品供给质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同时也逐步提高中国各地区的商品供给质量、供给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其五，针对市场中存在的过度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加以引导规范，同时也应当注意相关的政策可能会遏制在位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让一些头部企业、平台企业通过不同的方式赋能中小企业，不仅有利于共同富裕，也有助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二）以税制改革为基础，完善再分配政策

首先，在中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从税收结构来看，中国间接税比重较高，直接税比重较低，这使得中国企业税负较高。因此，税制改革应以降税率、宽税基为方向，由原先对企业征税，适当地转向对居民的收入或者行为征税。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也将提高中国直接税的再分配效果，促进共同富裕。例如，从2022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对电子烟征收消费税的公告》，既保障了居民的生命健康，也有效增加了中国的税收来源。

其次，对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在它们尚未形成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应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而对于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且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则可以适当放开保护补贴，让这些企业更充分地参与市场竞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促进产业进一步

升级。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类划分，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产业也应当采取不一样的财税制度安排。^①

最后，针对过去几年来少数群体通过非法手段成为高收入群体的问题，应该强化重点领域的权力制约，加强对非法收入的监管，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惩处力度，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

(责任编辑 王京京)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Wang Yong Jiang Yangti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stated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way to modernization that delivers common prosperity to all. How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n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First, we should improve primary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developing industr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regions to help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building a price system that can reflect the relative scarcity of factors to promote fair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Meanwhile, we should improve the secondary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tax system, i.e. reforming the consumption tax, banning illegal income, and establishing a redistribution policy appropriate to China's development stage, so that it can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hile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e path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Industrial Upgra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①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调整》，《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